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丛书

俞正梁 庄汉隆 董祥起 主编

A SERIE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国际关系理论 新视野

*NEW PERSPECTIVES
ON IR THEORY*

任晓 / 编

长征出版社

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

NEW PERSPECTIVES ON IR THEORY

任 晓 编

长征出版社

2001 年 1 月

责任编辑:王亚宁

封面设计:紫 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任晓编.—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0.8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丛书)

ISBN 7-80015-613-3

I.国… II.任… III.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0087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腾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2 印张

277 千字 印数:1-2500

定价:25.80 元

ISBN 7-80015-613-3/D·147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NAZGP/OP

丛书总序

俞正梁 庄汉隆 董祥起

国际关系已跨入新的千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新的希望和曙光。

几千年来，人类目睹了太多的暴力、苦难和非正义。在迈入新千年之际，巨大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我们头上：因人类缺乏良知而造成的全球性的动乱、灾难和危险，包括自然界的大规模报复，都可能威胁文明的存在，甚至人类的命运。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全球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大大滞后了。人们仍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滑行，传统的思维仍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民族国家发现它们无力解决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开创的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第一次遇到了全面的挑战。“超越威斯特伐利亚”萦绕于人们的脑际，挥之不去。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正在跨越新旧时代的边界，国际关系面临重大变革和更新。

新的千年呼唤新的理论，新的思维，以及新的机制。一个孕育中的新的国际社会有三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以人为本，全人类利益及其可持续发展优先；一是跨国性，全球性，全球发展、稳定与治理优先；一是知识革命，高科技健康发展及防止其异化优先。

首要的任务是转变人们的理念和理论创新。

世界开始摆脱超级力量的支配,开始走出由霸权者与被压抑者构成的怪圈,人类发展的局部性与封闭性正在走向终结,相互依存与整体性凸现。我们应当以新的思维,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把全人类和地球的命运置于中心地位,洞悉世界各国及整个国际社会除了以共同的责任感,明智和建设性的方式,非排他性的利益追求,共享整体性与多样性发展的成果之外,别无选择。

一个全球社会正在悄然兴起。新兴的全球事务不再是政府与政府间组织独占的领地,全球公民意识的增强和国际民众运动的出现,促进了国际民间社会的发育与壮大,非政府组织、次国家行为角色以及跨国公司,也正以更大的热情和力度,参与全球社会的构建。这决不是走向世界政府——这也许是更适合霸权滋生的肥沃土壤,而是人类共同组织地球生活,使之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国家仍然扮演主要角色,“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是虚幻的,但是民族国家体制必须作出重大调整。国家必须和其他角色合作,不再能垄断一切。国家之间的利益必须均衡,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必须均衡。主权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主权这一中心准则所蕴含的一切主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一切主权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的原则,以及一切主权国家的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仍然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内在的需求和外来的压力,迫使成熟的民族国家如西欧国家跨越国界,把越来越多象征国家独立的主权权力,让渡给一体化机构,以便集体行使,同样,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在坚持主权本质的同时,正在越来越多地对本国的主权权力加以自主限制,以适应迅速推进的全球化形势和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从中取得最大的发展

利益。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条件下,对于足以破坏国际和平的情势以及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权决定进行国际干预。联合国必须进行改革,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确立更民主、更有效的机制,以适应 21 世纪世界的深刻变革和革新。未来世界在民主的基础上,将逐步形成更多共同的理念、价值、利益、责任、规则和法治,逐步走向协调、合作、管理、较为有序和组织化,世界将会加速整体性和多样性的发展趋势。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与客观现实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反差,国际关系的变革从未面临如此艰难的抉择。

人们在欢庆新千年到来之余,忧心如焚于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不测之虞,世界生产力高歌猛进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陷入边缘化的困境,地区失控引起局势动荡不定和此起彼伏的冲突,霸权主义畅行而难以遏阻。越来越明显的问题将是:其他国家如何能够限制美国的权力和约束美国的行为?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对国际关系变革的巨大挑战,以及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急迫呼唤。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率先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到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这些以他们的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的鸿篇巨著,或以历史为镜鉴,或以文明为基点,或以地缘为视角,评说世事沧桑,指点天下大势。西方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源地,有深厚的底蕴,又兼有先行实践之利,理论创新层出不穷,自 20 世纪初国际关系学科形成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历史使然。也正因为如此,使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难免存在着许多大国的傲慢和霸权的偏见。

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来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改

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改革开放和中国国际战略的转型,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的转型,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舞台。理论始于实践的召唤,理论为实践提供强大武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从引进、批判、吸收到创新,开始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在8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未能真正站在与国外同行的同一起跑线上,因为当时的世界还处于冷战格局之中,我们的研究落后了约40年。1989年开始的国际格局转换,特别是新千年孕育的全球巨变,给我们带来了真正和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点的契机,有同等权利和机会去诠释、去预测,进行理论创新。大国战略研究、大国关系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霸权研究、全球化研究、冷战后全球政治范式研究、国际新秩序研究、国际体系研究、安全理论研究、国家主权研究、国家利益研究、综合国力研究,纷纷成为理论研究中的亮点,并有了可观的理论创新收获,但是,它们只是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和主张,远未形成具备整体解释力、一定预测力的规范的理论流派,难以满足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全球性大国的利益需求和应有的国际贡献。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悠久而灿烂文明的大国之一,理应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积淀着刚健奋进、勇于创新的生命力,积淀着中庸兼容、天人合一的和合精髓,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整合天下、和谐天下、凝聚天下的功能,是新的世界文明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开放性理论。对于全球多元化图景和多维度空间,各种理论、流派都有其特定的视角和切入点,都有其合理性。我们应以开放性的思维予以兼收并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一种不断创新的理论,创新是理论的灵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是独创性的,必须进行原创性研究和学理

性研究,必须有自己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论,因而也只能是创新的。它是民族的,因而也是世界的;它是民族的,却能正确反映世界,符合现在和未来国际关系的客观实际。它可以是宏观理论,也可以是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君子之学,不为则己,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濯去旧见,以来新意”。

鉴于此,我们推出国内首套国际关系理论丛书,以小小的奉献,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添砖加瓦,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黄金时代。

2000年3月

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他(代序)

任 晓

一、关于理论

什么是理论?对这一问题,据说有两种回答。一种回答是,理论是与某种特定的行为或现象有关的规律的集中或组合。在这种观点看来,理论比规律要复杂,但只是在数量上更复杂而已。在理论和规律之间,没有质的差别^①。另一种回答是,理论是解释规律的陈述,而不仅仅是规律的集中。理论同规律有质的差别。规律指出恒定的或很可能存在的联系。理论揭示这些联系为什么普遍存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对于天体上和地球上的现象做了统一的解释。它的力量在于能够把大量过去互不联系的、凭借经验的概括和规律,纳入一个解释的体系之中^②。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就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一概念的。

对“理论”一语,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理解。最为普遍的,是把理论理解为具体行为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即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理论及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理论”一语的。在国际关系学界,人们多把理论理解为对规律的探求。例如宦乡就说:“把过去的行为总结

起来,从中提出若干规律化的东西,把它条理化,规律化,这就是理论。我们就用这个理论指导未来的行为。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③另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从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本质和规律”^④。照此看来,理论是对规律的一种揭示和陈述。也许这是一种在中国被人们所广泛理解的“理论”的涵义,我们也不妨就在这种意义上来使用它。易言之,理论是对大量或众多的事实和现象具有解释能力的陈述,它具有普遍性。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467页。)一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同样不能没有理论建设。这种理论建设能使人站得比较高,看到一些现象和事件背后的东西,而不至轻易受一些事件和现象的左右。同样,一个具有理论思维的研究者,往往是在研究中更具有理论意识和思维穿透力的。

对理论存在着种种误解。一种情况是轻视理论,似乎只要是谈理论,便是脱离实际。这是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理论是来源于实际而又高于实际的。理论来源于实际,是指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思想材料都是来自于历史或现实的。为什么说理论又高于实际?因为它是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思想活动的升华。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它来源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而又对众多、反复产生的现象具有解释能力。理论也激发人们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去比较、验证、证明或证伪。从历史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历史;或者说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如此循环往复,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性认识就是这样发展的。

对理论的功能也存在着误解。第一种是片面的“服务实践”说,即认为理论研究的直接目的就是为实践服务。就国际

关系理论而言,这实践一般说来是外交实践。于是乎便推理出“我们的理论是为外交实践服务的”,这样一路下去,理论研究往往就变成了外交政策的诠释和发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当认真反思,它跟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太强有关系。就是说应用意识过于强烈,脑子里总是念念不忘一个“用”字。不是去穷究学理,而是生怕自己的研究不能为实际服务。但现实中所发生的情况往往是,一个研究者越是心里想着用,理论研究到头来却越是“没有用”,研究的“成果”就越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总是被时间的浪涛迅速地淘汰。这道理,对国外的理论亦复如此。西方的理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应用而建立起来的。很显然,若是与本国的外交政策亦步亦趋,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我们的任务是在重大的理论课题上建立起经得住考验的知识,而不管这种知识是否能直接明显地应用。”^⑥过于强调为实际工作服务,反而抑制了理论的繁荣和发展。这些年来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研究结果和出版品,便是一个例证。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研究者有没有真正揭示事物的规律或内在的理路,而不在于是否能直接应用。找到了事物的规律,服务于实践事实上也就水到渠成了。然而,这种情况是需要经过艰苦的研究工作之后才会出现的。

第二种误解是“拉近与现实的距离”说,即认为我们的理论与现实有距离,因此要拉近。这是进入了认识的误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已如上述。从理论产生的规律来看,它对实际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最后要“拉开”距离才能产生。理论思考是较之事实研究高一个层次的思考,它要求超越一般的对事件的描述和梳理,而达到理论的建立所需要的抽象度。这样看来,理论与事实之间存在着一个“有效距离”定理。也就是说,理论与事实研究和政策研究是属于不同层

次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有效距离”,没有升华,就事论事,是产生不了理论的。不难设想,如果仅仅停留于对事实的描述,是不可能出摩根索、沃尔兹的。

能否这样说,国际关系研究既要“就事论事”,又不能就事论事。就事论事是说要把事实和现象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要“进得去”;不能就事论事是说还要“出得来”,不能停留在对事实和事件的描述上,而要窥其堂奥,探其究竟。一句话,要提高我们国际关系研究的水平,需要训练理论思维,具有理论意识,学会理论思考。

二、关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根据这方面的情况,可以把建国以来的 50 年分为前 30 年和后 20 年。在前 30 年这样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与理论有关的研究反映在: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理论的阐释,如关于帝国主义及其与时代的关系等;第二,对本国外交政策的诠释或对领导人外交思想的整理、综合与阐发。70 年代曾提出过“三个世界”说,被称为“三个世界”理论,实际上它是把国内斗争的经验推而广之,根据敌友我而对世界进行的划分。第三,意识形态色彩强烈。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认为当前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等等,一度还自以为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第四,受非学术性因素影响大。例如受中国对外关系变化的影响非常大,理论性的思考因之“随风飘荡”。

于是 80 年代有一位外国学者称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solid journalism rather than scholarship”。大意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所做的工作是比较深入的新闻分析,

而不是学术研究。这话虽然说得绝对,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的实际情况,也是攻玉之石。不过,80年代情况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0年间,理论研究真正得到了发展。包括理论概念、理论观点、理论意识等,这是2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获得巨大发展的总体的一部分^⑥。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正在走向成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理论研究取得了成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实践也日益碰到各种理论问题而需要人们作出深入研究,例如主权、人权、安全、全球化,等等。如此相互激荡,相互促进。

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存在不少弱点,有些还十分突出。要发展我们的理论,这些问题是要很好地注意加以解决的。我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要从如下一些方面去努力,以改进和推进我们的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

第一,要注重学理的探求。科学研究有其一般的规律,它要求发现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建立理论。有学者指出,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成分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首先是对现有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其次是在讨论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与研究的问题密切相关的理论假设;第三是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从理论角度分析验证结果,得出研究结论^⑦。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还太缺少这样的研究,太缺少学术的自觉。如果理论研究者能够注意培养这样的学术自觉,并且身体力行地认真去做,形成习惯,理论的发展不是不可以预期的。

第二,增强我们的解释能力。“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科学工作者观察了大量现象,并试图寻找出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一种理论。”要使我们的思维超越 common sense(“常识”),就必须致力于增强解释能力。常识是经由观察获得的,但要对事件和现象的发生具有解释能力,就需要获得对于事物间相

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认识。

我们目前的状况是长于描述,短于解释。例如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使命感”,问题在于这种使命感为什么会那么强烈?对于美国的所作所为,用“粗暴干涉内政”、“新霸权主义”乃至“世界警察”等来加以批判是很容易的,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批判当然是有必要的,尽管要掌握分寸,但更重要的是“批判以后怎样”。我疑心我们是不是连批判的武器都还没有掌握,更别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话不能是“聋子的对话”,要有沟通才行,否则总是谈不拢。美国的观念中,惟我独“革”的色彩甚浓。这里的“革”作“正确”解。别人要么是未开化,要么是受了蒙蔽。美国人常常居高临下,仿佛绝对真理在握,我的制度和文化是最好的,你们都应该接受,我是为你好,你越早接受、越早实行对你越有利。这种认为世界上只有惟一种最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观念,从其思想根源来看,是一种来源于启蒙运动的一元论。要真正理解它,就得深究:它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与宗教(基督教)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它比较缺少宽容精神?中国文化有没有可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补正?等等。又如,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是“民主和平”论,要实现“和平”,就要让全世界都实行整齐划一的、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制度。这也是一种一元论。就是说,世界各国的制度应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同时,这也是把国内政治制度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挂起钩来。那么,在各国选择政治制度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有没有道义的优越性呢?是应一元呢还是多元呢?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艾赛亚·伯林曾经深刻地揭示了他所视为启蒙运动最根本的谬种:启蒙运动的信念即真理只有一个,各种好的东西不会最终发生冲突。伯林认为,有可能找到最终答案的想法“是一种幻想,而且是一

种非常危险的幻想。”如果有人认为的确有可能找到这种答案,那么就会认为付出再高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若能使人类永久地公正、幸福、和谐并拥有创造力,任何代价都不嫌过于昂贵。于是,“你宣称某项政策可以给你更多的幸福,更多的自由、更大的生存空间,但我知道你是错的。我知道你需要什么,全人类需要什么。”伯林说:“我认为,对人类最大的毁灭莫过于那种对完美生活的狂热追求,并将这种追求与政治和军事力量融为一体。”^⑧这些话是80年代时讲的,伯林本人也已经飘然仙逝,却至今读来仍如空谷足音,仿佛他预见到了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发展。1999年在巴尔干所发生的战争,不正是在政治和军事力量支持下的“狂热追求”吗?对于今天有人宣称的“民主”万能论、“市场”万能论,认为他们最终找到了人类终极真理的人,难道不是深刻的思想批判吗?可以说,伯林思想的核心本质上是多元主义。他看到了人类困境的复杂性,强调了不同文化同等的存在价值。……如此等等的问题,难道不需要我们去做出理论的分析?

第三,进行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这是学科和理论得到发展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原创性的研究甚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未能提出原创性的问题。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我们所讨论的很多问题产生于国外,然后我们加以引进。对于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提出解答固然有必要,但知识创新更重要的是要提出原创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没能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是否提不出具有原创性的问题?这是需要深长思之的。牛顿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中提出了“物体为何都往下掉”的问题,这个问题别人没有提出过,他提出了,这导致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合作安全”是一个新型的概念,“亚太地区能否建立起合作性安全”就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问题,因而已成为安全理论一个新的生长点。“问一个‘为什么’有效地激发了对其可能

的缘故或目的想象。‘怎么样’也是有用的问题，可引起对过程机理的思考。”^⑨提出原创性的问题，咬住不放，锲而不舍，就可能产生知识的创新。创新不是为新而新，而是由于它是知识所由增长和积累的途径，是在于使我们增强对事物的一般性认知。

第四，苦练内功，增长学问。“苦练内功”一语近年来在国营企业改革过程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实际上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完全适用。理论研究的发展最终是要通过研究者个体的创造性研究活动来实现的。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活动需要有多种准备，包括知识的准备和学术素养的准备。“也许，一个训练有素的思想家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不在佐证不足的情况下轻易做出结论；而未受训练的思想家则很可能这样做。”^⑩学者们总是带着他们深思过的思想、学术性的研究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进入那种激起他们好奇心的研究领域的。这是一种必要的支援，若没有这种支援，偶遇的思想就不可能结出硕果。反之，在有了知识的、创新意识的等多种准备之后，研究者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途径，持之以恒，深入思考，就有望登堂入室，做出创造性的研究。

有人提出理论研究应为国家利益服务，这个提法需要推敲。其实服务不是任何一种理论的目的，而只能是科学研究的结果。理论有别于政策，它首先不是为政策服务的。政策经常变化，具有易变性。而理论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对事物间相互关系的洞察，它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西方的理论也未必就是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服务的虽有，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学者的学术探索，例如沃尔兹通常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认为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又如以寇汉(Robert Keohane)为代表的强调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之作用

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等,也是如此。实际上,理论研究应避免过于强调为某某利益服务的观念。要不然的话,就成了意识形态,而不是理论。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常常是越是念念不忘服务,就越是服务不好。随风倒的“理论”,不是理论。

90年代曾出现过关于是不是应该提建立有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有赞成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⑩。我个人是不大赞成提“中国特色”的,因为这多多少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但是同时必须指出,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有一种志向,一种创新意识,要致力于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进而至于理论系统,因此我比较赞成提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有人认为,理论能不能够得到建立,进而能不能够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是跟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或曰国际地位分不开的。换言之,一国要想建立自己的理论并产生一定影响,必先这个国家要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国。这话有一定道理,注意到了客观的方面。美国的理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是跟它的超级大国地位分不开的。但是,恐怕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即研究者的主观能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拉美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不高,但产生于拉美的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不是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自成一家?新加坡小得不能再小了,但以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型外交家为代表的新加坡人发出了他们的声音,概括并肯定“亚洲价值观”,被称为“新加坡学派”。这里不管有多少争论和不同意见,毕竟它独树一帜,自成一派。

学派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东西,首先是有别于其他理论流派的基本概念,如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概念,“新加坡学派”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等等。其次是围绕核心观念进行的一套言之成理并能继续